



“亚洲自杀研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不过它们讨论了长期以来关于行为异常对自杀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

尽管自杀导致的死亡数量在亚洲死亡人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但自杀还是被多方忽视。
图片来源:MAHESH KUMAR A

亚洲人,你为何自杀

《科学》聚焦亚洲自杀现象,称完全颠覆西方研究

■本报记者 唐凤

Y 女士的死,可能让不少研究人员感到痛心和为难。

作为一位年轻的母亲、忠贞的妻子、传统的农村女性,Y 女士看上去并没有任何导致自杀的风险因素。似乎她也并不抑郁或是患有精神疾病。但是,当邻居公然指责 Y 女士偷了他的鸡蛋时,羞愧让她难以承受,她选择喝下一瓶杀虫剂,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颜面无存让人活不下去,”她在死前哭诉,“我要以死证明清白。”

Y 女士自杀的原因似乎与之前的研究有些出入。《科学》杂志撰文指出,亚洲自杀研究颠覆了长期以来对于驱使人们自杀的原因的认知。

偏离早期西方研究结论

西方国家数十年的研究将精神疾病作为引发自杀的压倒性因素,并指出有超过 90%的人因此自杀死亡。

另一个大的风险因素是性别。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美国男性的自杀率远高于女性,比例接近 4 : 1。其他相关的因素还包括,城市生活和离婚等。

不过,《科学》杂志称,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家 Jie Zhang 表示,在中国,Y 女士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自杀案例。

为研究精神疾病在中国农村自杀事件中的普遍性问题,Zhang 阅读了对 Y 女士家庭和熟人的访谈记录。通过心理解剖——调查分析死者临死前的精神状态以确定死因——Zhang 与合作者发现,392 位中国自杀受害者中只有 48%患有精神疾病。他们将相关研究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

另外,其他自杀标准风险因素在中国也不适用,甚至被颠覆。《科学》杂志指出,中国女性自杀率异乎寻常的高,农村居民自杀率也比城市居民高,并且已婚者的自杀率也略高。

总体而言,中国自杀案例占到全世界自杀案例的大约 22%。《科学》杂志的数据显示,每年大约 20 万人自杀死亡。同时,在印度,2010 年 18.7 万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艾滋病死亡人数的两倍。相比之下,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计,高收入国家的自杀案例每年大约仅有 14 万。但是,日本和韩国的自杀率却相对较高。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亚洲的自杀问题了解还远远不够。“自杀(在亚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加拿大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Prabhat

Jha 称。

现在,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兴起的相关研究填补了亚洲空白,并且推翻了之前流行的观点。“在西方,自杀研究的焦点一般集中在精神病学方面。”Zhang 说,在亚洲,虽然精神病也是一个研究重点,但是,研究人员需要从受害者的家庭、信仰、受教育程度和性格方面了解更多信息。

新发现还证明,一些研究人员可能误解了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Zhang 说,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精神疾病可能不是引起自杀的真实原因”。

令人沮丧的数据

亚洲自杀的可靠统计数据曾经一度匮乏,这让人很恼火。

在泰国,直到 2003 年,死亡案例报告没有需经医学确认的要求,这让该国自杀案例数据极不精确。而在印度,自杀是一种犯罪,这意味着自杀经常不被报告。

不过,泰国政府现在使用了一个计算死亡率更精确的报告系统,同时,印度研究人员也开始从“百万死亡研究”——一项长达 16 年的调查,相关人员依靠访问死者家属,来登记 100 万名印度人的死亡原因——中获益。“百万死亡研究”得出的结果令人极为不安,研究牵头人 Jha 说,“我们比较了新数据和官方统计,发现官方至少漏掉了 25%的自杀男性和 36%的自杀女性”。

在中国,2002 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宣称,美国艾莫利大学医学院的 Michael Phillips 领衔的研究小组估计,1995 年~1999 年,女性的自杀率要高于男性——比例大约是 5 : 4。

“最初大家怀疑这一结果是中国男女比例存在巨大差距导致的。”Phillips 提到,但是后来这个自杀比例还是被接受了。

《科学》报道称,目前,中国自杀者的性别比例大约是 1 : 1,仍然与美国的男女自杀 4 : 1 的比例有很大不同。在印度,男女自杀比例为 1.5 : 1,不过 15~29 岁年龄段群体的自杀性别比例也接近相等。“百万死亡研究”显示,在印度年轻成年人中,自杀是仅次于产妇死亡率的女性致死原因。不过,WHO 指出,全世界男女自杀比例为 3 : 1。

另外,在中国和印度,像 Y 女士这样没有明显精神疾病却自杀的案例很普遍。在印度,自杀在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中十分常见,这群人正开始面对工作、婚姻和各种新的生活压力。

这与西方模式的中年群体高自杀率形成鲜明对比,Jha 认为,这暗示着尽管“可能有一些潜在的精神方面因素,但是印度人自杀的主要驱动因素可能是社会条件”。

不过,印度自杀研究还需要进行详细的心理解剖,“这里存在一个合理假设,就是这些自杀的年轻人多数没有精神疾病。”他说。

致力于自杀研究的哈佛损伤控制研究中心的 Matthew Miller 则指出,亚洲精神疾病的识别、报告和发生率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中国工作了超过 20 年的 Phillips 也表示,对疾病未能作出全面诊断也是一个问题,至今“很多西方研究人员依然坚信我们只是遗漏了部分案例”,才得出这样的结果。

虽然未能作出全面疾病诊断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过自杀受害者中精神疾病患者所占比例较低已经被多项研究所证实,Phillips 说,“很多中国自杀者可能处于严重焦虑或紧张中,但是他们并不符合精神病的标准”。

建立新的预防机制

假定亚洲自杀风险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研究人员在努力寻找驱使自杀者结束生命的根源。一个线索可能隐藏在高比例的无计划自杀行为中。

《科学》杂志指出,2002 年,在对 306 位入院至少 6 小时并出现自杀企图的中国病人进行分析后,Phillips 和同事发现,其中 35%的人在 10 分钟内有了自杀念头,54%的人在 2 小时内形成自杀计划。

冲动在亚洲自杀者中起到的作用要高于西方自杀者,香港大学自杀研究和预防中心、最新 WHO 亚洲自杀报告作者之一 Paul Yip 提到。虽然冲动的个性有时与诸如躁郁症等疾病有关,但是中国相关研究并没有完全揭示人格缺陷在冲动自杀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基于一种扭曲的悲剧心理,亚洲冲动自杀者往往选择高致命自杀方法。与 505 位中国自杀者的家人和朋友交谈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家 Kenneth Conner 及其同

链接

全球合作 预防自杀

在今年第十个“世界预防自杀日”(9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预防自杀协会”联合发布报告称,全球每年有 100 万人死于自杀,多于战争和凶杀致死人数的总和。报告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促进在世界范围内预防自杀。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 40 秒钟就有一人自杀,有自杀企图或想法的人高达 2000 万。目前,自杀已成为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国家的自杀人数增长迅速,达 60%。

国际自杀预防协会、联合国、世卫组织和一些致力于志愿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一致认为自杀是可以预防的公共卫生问题,呼吁全球对这个问题加以重视,并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自杀预防工作。

目前,各组织开展了许多协作性的跨国自杀研究和预防工作。例如,美国预防自杀基金会资助的对匈牙利高自杀率的研究;罗切斯特大学致力于培训中国自杀研究员;英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和资助者在亚洲进行的减少服用农药自杀的研究,以及其他协作性的研究

事报告称,2005 年,与上吊或投水自尽的人相比,那些选择喝农药自杀的人可能当时处于更冲动的状态,行为也更加缺乏思考。

喝农药是中国和印度自杀致死的主要原因,并且是全世界约一半自杀死亡的原因。“使用农药也解释了亚洲不同寻常的自杀性别比例。”Jha 说。在西方,女性与男性一样会选择自杀,但是她们更倾向于服食安眠药,也常会被救活。

另外,当深陷两种或更多相互矛盾的压力中,这个人也可能自杀。Zhang 表示,正如“一个女孩,在家里接受儒家教育,到了学校后,学习了现代价值和性别平等”,她很可能出现自杀倾向。

其他环境压力还可能包括一个农村妇女面对突发事件缺乏应对机制——例如 Y 女士的例子,或者一个年轻人面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等。Zhang 发现,紧张理论支持了其研究课题,他还计划调查该理论是否适用于年纪大的中国人。

自杀趋势表明,亚洲需要一个新的预防策略。

Zhang 认为,应投注更多努力到“教会人们制定现实目标,以及处理危机事件”上,而非过多关注精神疾病。“这里,大学和农村妇女组织应站在前列,发起积极的自杀预防项目。”他说。

“在香港,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手段显示出不错的效果。”Yip 提到。过去数十年中,帮助学龄儿童处理压力的项目扩展到成年群体中,也使得自 2003 年以来,该地区的自杀率下降 27%。

学者们口中的“手段制约”——降低对自杀常用工具的使用——也是一个好方法。在斯里兰卡,曾经有三分之二的自杀者死于服食农药。1995 年,该国政府采取措施限制使用最有毒的农药、杀虫剂,结果在之后的 10 年中,斯里兰卡自杀率垂直下降了 50%。

但是,很多亚洲国家的资源仍然十分有限。中国和印度的大部分城市都还没有 24 小时自杀预防热线。

最后,Zhang 希望在美国人中检验紧张理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每年投入数百万美元进行精神疾病研究,以预防自杀”,他说,“但是,不管花了多少钱,培养了多少精神病医生,或我们在精神病临床上做了多少工作,美国的自杀率都没有下降”。自 1960 年开始,该国自杀率都徘徊在十万分之十至十万分之十二。

和预防工作,如完善和传播预防自杀的知识等。

早在 1996 年,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就相继建议,每个国家都应该制定一个国家预防自杀计划,并与其他公共卫生项目相衔接,建立全国性的合作委员会以监控此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对效果进行评估。

不断有国家采纳了这个建议,在公共卫生框架内制定了各自的全国性预防自杀计划,提高全国对于自杀问题的了解,为预防自杀立法(例如,确保更严格地控制枪械),并且积极筹集资金。

资料显示,国家预防自杀计划覆盖的范围很广,常见的工作有:改善对医务人员的培训,特别是提高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的关注、评估、治疗和管理;通过公众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自杀问题的了解;加强对自杀工具的管理;加强对急诊就诊的自杀未遂者的评估、治疗和随访服务;提高精神卫生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重症精神障碍者的服务水平;为识别出的高危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预防项目;鼓励媒体更负责地报道自杀事件等。

科学线人

全球科技政策新闻与解析

政事

欧洲科研预算谈判未果 结局好坏难料



新一轮欧洲科研预算可能遭到大幅削减,不过,相关谈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图片来源:欧盟委员会

欧洲研究人员或许应该为一件事感到庆幸,那就是在日前举行的欧盟预算谈判上,参与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这或许仅仅是延迟了坏消息的到来。之前发布的包括科研和教育经费在内的最新创新预算提案显示,新一轮预算将比欧盟委员会去年提议的 1640 亿欧元减少 15%。

上个月,27 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制定 2014~2020 年预算协议。考虑到整个欧盟地区的财政危机和预算紧缩,一些成员国认为整个欧盟预算应该大幅削减。英国首相 David Cameron 要求从欧委会之前提出的大约 10000 亿欧元预算中砍掉 2000 亿欧元。

在峰会召开数周之前,许多科学家和研究机构一直游说欧洲领导人对科技创新预算“手下留情”。

虽然,若干顶级政客——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 Herman Van Rompuy 等——表示将支持科研预算,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老谋深算”的政客无论如何也会大幅削减此项预算。

例如,Van Rompuy 提出的最新预算草案建议,大量削减创新预算以及运输和能源预算,以抚慰那些坚持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农业和所谓的凝聚力基金中的国家,这将对欧洲较为贫困的地区有利。实际上,这两个项目占据了整个预算的大部分,并且背后有强大的力量支持。

会议结束后,与会者表示距离各方妥协和达成协议还很遥远,他们需要再次会谈。而领导们则需要在 2013 年底敲定一个协议。如果到时还未能达成一致,那么 2014 年预算只能参照上一年的标准,并进行通货膨胀率调整,直到他们最终达成妥协。

不过,进行磋商的各国对科研预算“不太看好”,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 Heiga Nowotny 说,“农业和凝聚力基金等的既得利益者力量太大,太具压倒性”。(张章)

人事

美国众议院 科学委员会主席易主



Lamar Smith 将担任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新任主席。

图片来源:news.sciencemag.org

日前,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推荐众议员 Lamar Smith 担任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新任主席。依据 The Hill 对 Smith 的报道,他在一个领带上装饰着行星和宇宙飞船的岗位上,监督着美国宇航局和其他空间相关研究部门的研究小组。

此次推荐有望在众议院共和党的一次选举中被核准,这意味着众议员 F. James Sensenbrenner Jr. 没有足够的筹码赢得他的第二任航空航天与空间研究主席的职务。第三位候选人——众议员 Dana Rohrabacher 已经失去了第二次参选的机会。明年 1 月,Smith 将正式接任新的职位。

Smith 今年 11 月刚刚赢得自己在国会的第 14 任任期,他已经在其科学小组工作了 26 年。他因在移民和刑事司法事务上坚定的保守立场而闻名,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能与民主党人和平相处的娴熟立法委员。在气候变化领域,他还是政府行为的怀疑论者。

不过,许多大学和科学机构的华盛顿游说者都表示,他们希望 Smith 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他们认为他是一位务实的法律制定者,他很有可能使科学委员会重新振作。在当前主席、众议员 Ralph Hall 的领导下,科学委员会显得相对平静。(杨济华)

